

从隔阂到冲突：希腊-阿拉伯翻译运动的伍麦叶起源

From Estrangement to Conflict:

The Origins of the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in the Umayyad Period

韩慧云 /HAN Huiyun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中亚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00)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Institute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摘要: 希腊-阿拉伯翻译运动的起源研究往往专注阿拔斯王朝(751-1258), 忽视了此前时期的相关社会历史。如果宗教间的辩论被认为是开启翻译运动的重要动机, 那么对于希腊-阿拉伯翻译运动而言, 相应的辩论动机恰恰形成于伍麦叶时期(661-750)。在阿拉伯统治早期的地中海东岸, 基督徒与希腊学术典籍以及阿拉伯人之间还存在多方面的隔阂, 这一定程度上限制着相应智识交往的发生。正是7世纪末阿拉伯内战的告终以及哈里发马立克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 才造成基督徒与穆斯林间的正面冲突, 加剧了两者的对立, 并最终引发宗教论辩。由此基督徒精研希腊哲学论证, 学习阿拉伯语, 为希腊-阿拉伯翻译运动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关键词: 希腊-阿拉伯翻译运动 伍麦叶时期 哈里发马立克 宗教辩论

Abstract: Studies of the origins of the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have often focused to the Abbasid period (751-1258), ignoring the relevant social history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If interreligious debates are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motivation for initiating the translation movement, then, for the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such debat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Umayyad period (661-750). In the early years of Arab rule, there was a multifaceted estrangement between Syrian Christians on the one hand and Greek sources of learning and the Arabs on the other, which largely limited the corresponding intellectual exchanges. With the end of the Arab civil wars at the end of the late 7th century and the rise of the caliph Malik to power, the antagonisms and conflicts between Christians and Muslims were intensified and led to religious polemics. As a result, Christians studied Greek philosophy and argumentation, and learned the Arabic language, thus making important preparations for the later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Key Words: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Umayyad period; Caliph Malik; Religious debates

中图分类号: K135; N09 DOI: 10.15994/j.1000-0763.2025.12.008 CSTR: 32281.14.jdn.2025.12.008

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肇始于一场声势浩大的翻译运动, 因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成果是将希腊语的科学、哲学著作译为阿拉伯语, 故常被称为希腊-阿拉伯翻译运动(下称翻译运

动)。一直以来, 人们坚信这场翻译运动与伊斯兰帝国历史中的阿拔斯时期(750-1258)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谈及翻译运动的起源时, 学者们的眼光也几乎都聚焦在公元750年之后的

收稿日期: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开放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ICASND2024017);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文明互鉴视域下希腊-阿拉伯翻译运动中的群体交往研究”(项目编号: 2023lzujbkydx015)。

收稿日期: 2023年10月30日; **返修日期:** 2025年4月10日

作者简介: 韩慧云(1991-)女, 河北南皮人,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中亚研究所讲师,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Email: hhanhy@163.com

历史，至于此前的社会历史情况，即便是与之相邻的伍麦叶时期（661-750），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从可以考证的翻译文本的数量来看，阿拔斯王朝确实当得起“伊斯兰大翻译运动发生时期”的名号，但如果人们想探寻翻译运动发生的缘起，那么探查的目光是否就不必局限于此了呢？

对翻译运动起源的探查往往会被等同于对发起翻译运动之动机的总结，其中宗教辩论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动机。（[1]，p.33ff）然而，仅仅是将翻译运动归因至宗教辩论并不足以回答相关疑问。如果宗教论辩是翻译希腊典籍的动机，那么这个动机是如何诞生的？如果说来自不同宗教的人们间的遭遇就会导致辩论，那么相关辩论就应诞生于阿拉伯征服基督徒盘踞的叙利亚等地之际，而不需等到100年后的阿拔斯建朝。显然，我们需要更多的历史事件来呈现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从遭遇彼此到产生宗教辩论的过程。

其次，翻译运动不仅需要触发它的动机，还需要一些使其得以开展的条件，具备翻译能力的人员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对此，人们往往认为存在一个同时精通希腊科学典籍和希、阿双语的群体，他们只需要等待被阿拔斯的英明君主召集到巴格达，与其共同拉开翻译运动的序幕。然而，相关历史展示出的却是，伊斯兰帝国治下的居民，即便是其中的基督徒群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希腊典籍和阿拉伯语的掌握程度都是有限的。这也正是翻译运动早期的译出语言多为叙利亚语，而非阿拉伯语，以及早期的阿语译本往往词不达意的原因之一。而当人们意识到上述希腊典籍与阿拉伯人之间的距离时，阐述裹挟两者逼近对方的历史过程便极有必要了。

本文关注伍麦叶时期的社会历史，挖掘的是翻译运动起源的早期脉络。通过探查彼时的叙利亚基督徒与阿拉伯人从遭遇彼此，经历隔阂，再到发生正面冲突的历史，本文呈现了诱发翻译运动的宗教辩论动机的形成过程，及此过程中基督徒精研希腊文本，学习阿拉伯语，以此弥合希腊典籍与阿拉伯人之间距离的故

事。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提及的叙利亚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指今天的叙利亚国，而是指地中海东岸，包括现今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黎巴嫩等国的大叙利亚区域（the Greater Syria region）。早期的阿拉伯人视该区域为一个整体，称之为沙姆地区（بلاد الشام），字面意为“左手边的土地”。本文所论及的基督徒不仅分布在当今叙利亚国所辖地理区域，而是分布在前述的大叙利亚区域。但因为很多文献在论及历史上的叙利亚地区或人员时仍称之为叙利亚（Syria），为了引述的直观性，本文亦将历史上的大叙利亚区域简称为叙利亚。当需要指称当今叙利亚国所辖地理区域时，本文会特别注明。

一、遭遇：前伊斯兰时代的叙利亚与阿拉伯的征服行动

科学史家林德伯格（David Charles Lindberg）认为，中世纪早期希腊科学在地中海以东的发展可以归结于两条线索，分别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征伐、殖民和基督教的传播。（[2]，p.169）这可以说是学界的共识。只是在此之外，人们往往还感到在伊斯兰军队征服叙利亚之前，那里早已沉浸在地中海湿润气流和希腊化文明的氛围中，毕竟亚历山大东征，以及之后的拜占庭、波斯的统治都辐射到了这一地区。

但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正如叙利亚不仅有地中海沿岸的湿润气候，也有沙漠地带一样，那里接受到的全部文化影响也并非只是希腊化的。唐纳（Fred McGraw Donner）就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叙利亚处于两块文化海洋——地中海文化和阿拉伯半岛文化——之间。（[3]，p.95）这一方面表明了，叙利亚人并非都是亲阿拉伯的，尤其是那些希腊化程度高，对拜占庭忠诚度高的叙利亚人，他们与阿拉伯势力间如果不是敌对的，也至少是有隔阂的。因此，在成为伊斯兰帝国翻译活动的主力前，显然需要某种力量将这些叙利亚人推向阿

拉伯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在这片交杂着两种文化的地域,希腊文化及其典籍的存在状态可能是零散的,需要被慢慢发觉。在阿拔斯王朝认可希腊典籍的价值并组织境内知识分子如火如荼地将其翻译前,应当需要某种力量去达成对希腊典籍的基本了解,叙利亚——作为联结希腊与阿拉伯的中介——亦需要进一步缩短其与希腊以及阿拉伯间的距离。而提供这些力量便是伍麦叶时期在翻译运动中的角色。

1. 前伊斯兰时代的叙利亚

自亚历山大东征以来,确实有不少说希腊语以及受希腊-罗马文化教育的人来到叙利亚,([3], p.92)但叙利亚并没有被希腊化的影响吞噬。直到公元7世纪,叙利亚仍有一大部分人口保留着闪族文化,除了某些城市的贵族阶层,叙利亚人并没有改口说希腊语。([3], p.94)另一方面,同说闪族语言的叙利亚人与游牧人在叙利亚干草原上的密切接触,以及两者之间的商贸往来,也使得说闪族语言的叙利亚人免于被彻底希腊化。([3], p.94)不过基督教确实为叙利亚地区广为接受。([4], p.86)虽然他们多信奉一性论(Monophysite),而非当时拜占庭正统信仰的双性论(Dyophysite),拜占庭的教堂也只在叙利亚说希腊语的贵族社区存在。([3], p.94)

传向东方的希腊学术典籍大部分保存在拜占庭,^[5]但与科学相关的那部分知识并不是拜占庭世界的主流。从侧面的研究来看,彼时西罗马和拜占庭的基督教堂以及修道院虽然可能利用一些古典学术来丰富它的教育体系,其中的教育内容主要是读写、修辞、数学、哲学以及自然哲学的内容,但总体来说,由于被认为不是服务于永恒的神圣者,后面这一类学问在被研究的程度上仍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2], p.159、167)早期伊斯兰方面的记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基督教压制了哲学学问在拜占庭世界的发展,除了国王尤利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曾短暂的恢复过哲学传统外,这些学问只可能很偶然地被有天赋的心智接受。^[6]

至于希腊自然哲学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渗

入了叙利亚,很难作定量的估计。布洛克(Sebastian Brock)认为叙利亚地区希腊化的进程从5世纪开始,在7世纪达到顶峰,叙利亚应该接收了不少希腊学识。^[7]但这些学问在多大程度上被研究并被保存到了他们与阿拉伯人的遭遇和交往的时期却是未知数,尤其是考虑到9世纪的译者在翻译盖伦著作时依然遇到很多专业术语理解和翻译的难题。^[8]

叙利亚对希腊典籍的引入或翻译大概开始于5世纪,并持续到阿拉伯人入侵叙利亚的前夕,^[9]不过却少有证据表明这类活动也在随后的时期发生。^[10]这似乎暗示了,随着阿拉伯人深入叙利亚,叙利亚的学术活动因受到干扰而一度停滞。同时,这一时期叙利亚人的民族身份认同逐渐显形,即出现以叙利亚语、对祖先血统的认知等标准区分出叙利亚人的意识。^[11]这种意识也可能会扩大他们与希腊人、罗马人及其文化的距离。

2. 征服叙利亚

赫勒敦(Ibn Khaldun)认为征服者建立统治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征服地是否由多部落组成,在像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征服者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势力。^[12]但实际的征服过程似乎并非如此顺利。阿拉伯人主叙利亚的情况可以按入城的方式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和平征服,第二类是武力征服。大马士革(Damascus)就是和平征服的一个例子。武力征服则发生在阿拉伯军队受到反抗的城市,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破坏和杀害也许无可避免。

相应地,叙利亚人对阿拉伯征服的态度也可分为两类。一方面,对于部分叙利亚平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阿拉伯的征服并不算是一种入骨的亡国之痛。由于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同属于闪语民族,而且阿拉伯人自古就有向叙利亚移民的传统,阿拉伯人对叙利亚的征服也可被认为是标志着叙利亚经过波斯人、马其顿人、希腊人和拜占庭人统治后重新回归闪语民族。^[13]更不要说,在阿拉伯军队征服叙利亚之前,叙利亚自身既由于拜占庭和波斯萨珊王朝的交战而深受苦难,([14], pp.16-17)又因为与名义上的统治者——拜占庭人——间的宗教分

歧而感到不满。^[13]甚至还有研究指出，拜占庭军队在撤离时劫掠过叙利亚。（[4], p.94）所以，当军纪严明、士气高涨的阿拉伯军队出现在叙利亚时，叙利亚的居民们便把这些来者视为解放者，有的城市甚至列队欢迎。^[13]

另一方面，伊斯兰征服行动依然可能对叙利亚的某些地区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对叙利亚的考古研究发现了几座城市的废墟，根据废墟内掩埋的硬币，可以大致推测出相关建筑物遭到摧毁的年代。其中，大马士革的废墟大部分可以被看作是633年和659年记录在册的大地震所致；但另外几个城市——尤其是今以色列境内的凯撒利亚（Caesarea）——遭到的打击就有一定的可能是阿拉伯军队所为。（[4], pp.95-96）其原因之一可能是阿拉伯军队在这里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因而战斗也较为激烈。所以，曾经生活在这类地区的幸存者，大概很难对阿拉伯人生出感激的情绪。后续记载亦显示，凯撒利亚一直都在抵抗阿拉伯人的征服。（[15], p.276）

更糟糕的是，阿拉伯的征服行动还造成了叙利亚海岸，一般也是希腊化程度高的城市人口流失。据估计，走海路离开的人口可能有几十万。（[4], p.113ff）（[14], p.3）但当时的阿拉伯人并不是很在意这一点（[4], p.113），显然彼时的阿拉伯人并没有继承前朝“智库”的考虑。亦有迹象表明，在7世纪，叙利亚沿海许多城市中留在伊斯兰帝国统治的群体并未完全归顺阿拉伯人，而是在阿拉伯和拜占庭之间摇摆。（[15], p.276）其他靠内陆的城市也有大量居民出走。如果说在大部分征服地都大概有一半的房屋被阿拉伯侵入者占用，那么从这些地方逃离的难民大概也就有一半。（[4], p.125）

叙利亚城市人口的流失必然折损了基督徒及其所能利用的智识资源。这一情况连同叙利亚的非完全希腊化一起，对于不久后发生的翻译运动来说，构成了不利的条件。当然以上是一些外部境况的描述，另有说法认为，3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的传统文化更多只留存在教会中。^[16]接下来，本文将更有针对性地调查

遗留在伊斯兰这一崭新帝国中的基督教会内情况。

二、隔阂：叙利亚基督徒与阿拉伯穆斯林

无论是否考虑与翻译运动以及阿拉伯科学史的关系，基督教徒对于伊斯兰研究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这首先是由于其庞大的体量。4世纪起，阿拉伯人中就开始有基督信徒。（[17], p.5）在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耶路撒冷以及北非、西班牙，大多数人口都是基督徒。（[18], p.11）从7世纪后半叶到11世纪，伊斯兰地区拥有世界上50%的认信基督徒（confessing Christians）。^[19]

另外，基督徒在伊斯兰的地位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首先，面对阿拉伯人的征服，基督徒有时会作为征服地的代表与之对话。基督徒代表会与率兵而至的阿拉伯人讨论开城投降的条件，负责将签署的停战文件保存在教会资料馆等。（[20], pp.9-12）其次，人们认为在后征服时期，有基督徒长时间内为伊斯兰王朝的统治者和贵族工作。甚至到阿拔斯早期，基督徒似乎已经得到了某种特权地位。（[17], pp.11ff）

那么在被统治和获得特权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传统观点对此的回答也许是，穆斯林一直都很尊重有学识的基督教徒，他们相处愉快，彼此信任，所以，基督徒在伊斯兰宫廷的仕途以及在世俗生活的地位的上升，包括基督徒在8、9世纪为阿拉伯的统治者和贵族翻译希腊典籍的事迹都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实际的情况可能远比这复杂、微妙。与被征服的平民不同，有书写权利的基督徒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阿拉伯入侵者及其宗教的负面情绪。相比于对闪语系中的阿拉伯语的生疏，彼时征服地的基督徒也更熟悉叙利亚语。基督徒与阿拉伯人的以上隔阂表明，此时的基督徒还不是从事翻译运动的合适人选。

1. 前伊斯兰时代的叙利亚基督徒：教派与语言

在与伊斯兰正面接触之前,叙利亚主要是基督徒的地盘,他们又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是叙利亚的非卡尔西顿主义(non-Chalcedonians),主要是一性论(Monophysites);二是叙利亚的卡尔西顿主义(Chalcedonians),主要是麦基派。^[21]这个区分方法利用了公元451年举办的第四届大公会议(普教会议, Ecumenical Council)——卡尔西顿公会议(the Council of Chalcedon),公会上确立了基督耶稣一个实体(hypostasis)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两种属性(nature/physite)的主张。根据是否接受并维护卡尔西顿公会议对基督的神学解释,基督徒可以被分为卡尔西顿主义和非卡尔西顿主义。

这两个教派各自的特点鲜明。从地域上来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今叙利亚,大部分说阿拉伯语(以叙利亚语为主)的基督徒(Aramean Christians)都没有接受卡尔西顿主义;接受卡尔西顿主义一般是在西奈(Sinai),巴勒斯坦(Palestine),外约旦(Trans-Jordan)的基督徒,在他们的教堂里希腊语是主导。^([18], p.12)从社会成分来说,说叙利亚语的非卡尔西顿主义往往来自乡村,而卡尔西顿主义的麦基派则主要来自城市里说希腊语的居民。^[22]

结合以上两点,麦基派群体可能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与希腊文化也有更深的交融。麦基派的核心据点是耶路撒冷,这座圣城由此吸引了当时受麦基派影响的一波波学生、僧侣和居民前往。^([23], p.17)在6世纪和7世纪,卡尔西顿主义的圈子: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已然是希腊文学和神学文化的中心。^([23], pp.17-18)^[24]

无论是哪个教派,他们都会阅读和参照希腊语的宗教典籍(可以推定各教派中都至少有一部分的群体熟悉希腊语及其宗教经典),有所区分的是礼拜和告解(liturgical and confessional)用语。这表示,不同教派的教徒所处的语言环境就不尽相同。叙利亚的一性论教派会用叙利亚语来做礼拜,可以想见,这一教派中拥有大量掌握希腊语和叙利亚语的双语人才。而巴勒斯坦、约旦等地的卡尔西顿教会

用语从4、5世纪起便以希腊语为主,虽然因为教会里往往有其他语种的信徒,他们也能以自己的母语组织礼拜仪式。^([25], p.13ff)不过,早期麦基派内精通阿拉伯语的人可能很少,因为当他们向教会里不会希腊语的阿拉伯人讲述希腊圣歌(hymn)时,他们不得不选择将相关教义翻译为叙利亚语(同属闪族语言,更容易被阿拉伯人理解)。^[26]

其实,在6世纪初卡尔西顿主义流行并成为正统后,一性论仍在一些说叙利亚语的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使得叙利亚语在卡尔西顿教会执行礼拜时很不受欢迎。^([23], pp.14-15)即便如此,当需要以叙利亚为中介与阿拉伯基督徒沟通时,他们依然可以找到精通希腊语和叙利亚语的信徒。

这一切说明,一方面,无论是卡尔西顿教会还是在非卡尔西顿教会,寻找希腊语-叙利亚语双语人才是比较容易的。有研究显示在9世纪前,在巴勒斯坦地区,尤其是与修道院相关的群体都大致掌握希腊和叙利亚双语。^([25], p.16)于是,人们便更好地理解翻译运动的如下特点:即如果希腊学术主要通过基督教会教徒保存和传播,而叙利亚语从一开始就是基督教及其宗教经典传入阿拉伯的媒介语言,那么当然,希腊学术著作也会首先经由叙利亚语为中介传入阿拉伯世界里。

另一方面,与希腊语翻译到叙利亚语的畅通性和惯性相对应的,希腊语是否要被翻译为阿拉伯语似乎就不重要了。由于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的亲缘性,基督教传向阿拉伯人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借叙利亚语沟通。已经有研究表示,阿拉伯半岛的基督教会的礼拜和告解语言一开始可能是阿拉伯周边民族的语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叙利亚语。^([18], p.9)所以在希腊语可以流畅转为叙利亚语的情况下,人们就不需要直接从希腊语译到阿拉伯语。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基督教在4世纪就成功传入阿拉伯半岛^([17], p.5),但直到7世纪末希腊语和阿拉伯语间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壁垒,^[27]后者似乎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干涉便很难逾越的。

2. 伊斯兰统治下的叙利亚基督徒: 叙利亚

教徒对伊斯兰的抵触态度

面对希腊和阿拉伯间的语言壁垒，仅凭叙利亚语的中介作用，以希腊语书写的各类典籍就可以畅通无阻地流淌到运行阿拉伯语的头脑中，希腊文化就能由此轻松顺利地在阿拉伯的土地上重生吗？

阿拉伯通史勾勒出的多是穆斯林尊重基督徒并与之和谐相处的温馨画面。在这幅画面里，叙利亚的基督徒作为阿拉伯人眼中的“有经人”，得到了相应的保护。确实，根据穆斯林一方留下的文献，哈里发欧麦尔（Umar ibn al-Khattab）曾主张善待征服地的人们，不给他们施加过重的税收；然而叙利亚基督徒方面的声音则几乎一致表达他们不堪承受财政上生不如死的压力（*hasher than death*）。（[4]，p.171）

总之，本文尝试传达一些不同的声音。在伍麦叶政权建立初期，不同信仰的群体间有着不应被忽视的张力。虽然伍麦叶时期鲜有相关宗教暴乱的报道，即这两者间的隔阂和张力并未导致行动上的反抗，但征服地的基督徒心中仍然对其旧拜占庭抱有忠诚，相信旧主会打回翻身仗。（[28]，p.501）

这个观点在许多叙利亚一性论基督徒留下的文献中得到了印证。684年，在名为琴内什尔（Qenneshre）的修道院，神学家亚他那修（Athanasius of Balad）写的书信中就可发现一性论基督教对伊斯兰的排斥态度。（[29]，pp.69-70）约作于690年的《伪美多德启示录》（*Apocalypse of Pseudo-Methodius*）也表达了类似的倾向。简言之，截止至这一时代，叙利亚基督徒并不承认阿拉伯人的统治地位，他们不断书写对阿拉伯人统治即将结束的预言，认为阿拉伯人对这片土地的掌控只是一时的，拜占庭的反击即将到来。甚至，某些阿拉伯人自己也有这种感觉。^[30]这种不屑承认阿拉伯人统治地位的情绪阻止着基督徒正视和靠近阿拉伯人及其宗教、文化。

此外，对于阿拉伯征服是否劫掠以及毁坏

叙利亚地区这一问题，虽然学界还没有严格的定论，但彼时叙利亚基督徒留下的记录基本都是谴责阿拉伯人的。（[4]，p.105ff）从中亦可窥见叙利亚基督徒对阿拉伯人的态度。两者间的分歧还体现在对税收的评价上。阿拔斯方面总是强调伊斯兰不向主教（*bishops*）收取税赋，但伍麦叶时期的情况却可能并非如此。（[20]，pp.9-13）

3. 阿拉伯人的自我隔绝

需要补充的是，面对上述抵触和疏离，阿拉伯方面并非很主动。相反，也许正是在叙利亚智识阶层的压力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阿拉伯人选择保护自己。一个典型的做法是，征服早期，他们在关键城市的周边建立军事驻地，比如富斯塔特（旧开罗，Fustat）、库法（Kufa）、巴士拉（Basra），通过军事威慑以及宣传造势来树立统治的权威。（[28]，pp.502-503）同时，这些驻地城市作为穆斯林的坚强堡垒，将穆斯林与被征服地里那些可能有异心的居民相互隔绝，由此穆斯林势力得以无干扰地在其中发展壮大，并在之后渗透到周边地区。^[31]（[3]，pp.226-245）唐纳称这类做法是一种自设的隔绝（*self-imposed isolation*），它令穆斯林保留了自己在宗教和语言上的特色，使之免于在文化适应中被影响或抹去^①。（[14]，p.137、140）这种隔绝可能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短兵相接之时，伊斯兰这一异样的文化和宗教，自然会引起基督教的注意乃至不满。

三、冲突：内战、改革与宗教论辩

宗教间的辩论被认为是开启翻译运动的重要动机，但宗教间辩论的开始并不是自明的或无需推敲的。阿拉伯人与基督徒因7世纪初的征战而遭遇彼此，但这两个群体间在宗教立场上的冲突并非就此触发。这一方面是源于前一章所述基督徒与阿拉伯人之间的隔阂，另一方

①必须要强调的是，这种隔绝是一种态度，一种相对的隔绝，由于要统治所征服的土地，阿拉伯人当然并不可能完全避免与外族接触。

面则因为,彼时这两个宗教间的差异和对立也许并不像今天人们印象中的那样显著。诞生于7世纪初期的伊斯兰教需要时间来发展出自身的独特性,而在此前,至少在神学争议上,伊斯兰教并没有被基督徒重点关注。打破这一局面的契机要从阿拉伯第二次内战的告终说起。

1. 阿拉伯内战:叙利亚基督徒对阿拉伯政权的接受

叙利亚基督徒的抵触情绪可能随着7世纪阿拉伯的两次内战迎来了两波高峰。第一次内战发生在穆阿维叶一世(Mu'āwiyah ibn Abī Sufyān)继位之际,这场血腥的内战令阿拉伯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分裂,这显然使近东地区的基督教徒产生了希望,认为阿拉伯统治的日子即将结束。([15], p.290)他们感到《圣经》的《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所预言的解放之日似乎就在眼前:“他们毁灭的日子近了;主已经准备好降临在他们身上。”^[32]不过令这些基督徒失望的是,拜占庭方面并未把握住这一机会。第二次内战则由马立克(Marwan ibn al-Hakam)与祖拜尔家族(Zubayrids)的政权争夺触发,它再次给了拜占庭的支持者以希望。但彼时的拜占庭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发动持续的领土侵略运动,同时,帝国还面对瘟疫带来的人口压力。([15], p.296)随着马立克在内战中获胜,拜占庭在整个近东地区恢复统治的机会也随之消失。

不同的是,相比于拜占庭错过的上一次复苏机会,阿拉伯第二次内战的结束使拜占庭及近东地区出现了深刻的转变。

一方面,拜占庭的统治层基本放弃了对近东地区的争夺。查士丁尼二世(Flavius Justinianus II Rhinotmetus)于692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昆尼色克特大公会议(Quinisext Council)也许是一个标志。即拜占庭方面不再尝试与东方的非卡尔西顿基督教团体进行接触,因为那已经不重要了,大公会议着力的是将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向西传递。([15], pp.296-297)

另一方面,到七世纪末,几乎所有人都清楚这次阿拉伯人的征服不同于偶然的劫掠,他

们的统治将会长期存在。([15], p.298)([17], p.10)在写于8世纪初的《小约翰启示录》(*Apocalypse of John the Little*)中,基督徒虽然在其言辞中依然将这些来自南方的统治者看作邪恶且喜好劫掠和压迫他人,但却也已然将阿拉伯政权与拜占庭、波斯等一起算为王国;显然他们已经不再指望阿拉伯人的政权能够快速崩盘。([29], pp.146-148)记录了阿拉伯政权自先知以来历任统治者的年表“Chronicle ad 705”进一步体现了这一点。待这样的趋势延续到阿拔斯王朝时,情况俨然已是——叙利亚方面的文本中出现了赞美伊斯兰的文字。^[33]

2. 马立克的阿拉伯化改革:基督徒与穆斯林的信仰对立

第二次内战的胜利虽然令拜占庭和叙利亚方面接受了阿拉伯政权将持续存在的现实,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阿拉伯内部一定程度的分裂,动摇了马立克统治身份的稳固性。为了重塑被内战折损的统治权威,马立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后者给征服地的基督徒带来了不少压力,继而促使基督徒们走出了对翻译运动至关重要的一步。

首先,马立克积极利用宗教力量来为自己加持,于是,对征服地的基督徒来说,伊斯兰教信仰的存在感一定是变强了。马立克使用了《古兰经》(Qur'an),中“上帝的代理人”(deputy of God),亦即“哈里发”(خليفة)的概念,没有记录表明此前的其他阿拉伯统治者会这样自称,马立克应该是想借此表达他的统治者身份是被《古兰经》担保的。([14], p.211)此外,马立克也希望树立其作为先知穆罕穆德(Muhammad)后继者的形象,([14], p.205)与此相映照的是他对先知的强调。7世纪末,亦即马立克统治时期开始,先知的名字愈发频繁地在信众官方文件中;马立克采用了先知故乡所在的汉志(Hejaz)地区的度量衡,还曾下令整理伊斯兰早期的故事(比如,先知接受启示的故事),这些被认为是在利用臣民对先知的感情来巩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14], pp.205-216)

伴随着对先知以及《古兰经》的强调,马

立克鼓励阿拉伯-穆斯林建立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这使穆斯林和基督徒群体间界限变得前所未有得分明。在伊斯兰教兴起时，阿语中的信众(مؤمنون)一词涵盖了所有认主同一的(信上帝/真主的一神论)教徒，阿拉伯早期的铭文和相关记述一般也只提及单句清真言(singular shahada)——“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万物非主，唯有真主)。([14], p.212、214) 此时，穆斯林和基督徒群体间差异和对立并不显著，早期阿拉伯信众甚至还曾加入到基督徒和犹太徒中一起履行宗教仪式。([14], p.214) 而在马立克时期，基督徒、犹太徒被从信众一词的涵义中剥离，此后信众只适用于追随《古兰经》教义的人，也就是穆斯林。([14], p.204) 相关镌刻铭文中也出现了双句清真言(double shahada)——“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ا رسول الله”(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穆德是真主的使者)的雏形，这种对于先知穆罕穆德的强调，也在彰显伊斯兰教义与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

更令基督徒感到冒犯并促使基督徒与穆斯林间产生冲突的，是马立克种种举措中透露出来的反基督教倾向。其实，直至伍麦叶早期，穆斯林都还很重视基督徒的宗教理念，正是在马立克时期，伊斯兰帝国才开始着手抹去境内沿用的拜占庭硬币上那些基督教符号图案，后者代表了基督神性等意象。([14], pp.212-213) 如马立克重新建立伊斯兰帝国的币值，并在新金币上印刻“الله واحد الله الصمد لم يلد ولم يولد”(真主唯一，是万物仰赖的主，他无父无子)这很可能是对基督教三位一体(Trinitarian)理念的攻击。([14], pp.208-209) 在马立克任期内重修的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①的拱廊上也镌刻有“ولا تقولوا ثلاثة”(不要说“三”)，“إِنَّمَا اللهُ إِلَهٌ وَحْدٌ”(主是唯一的主)。此外，圆顶清真寺还镌刻了铭文“محمدًا رسول الله”(穆罕穆德是真主的使者……耶稣，玛丽亚的儿子，亦在此列)，这显然是在反对基督教对耶稣的神性定位，据

称此举彻底刺激了生活在马立克统治下的基督徒。([35], p.417)

3. 叙利亚基督徒的宗教辩论生活：弥合希腊与阿拉伯

马立克的上述做法显然会导致伊斯兰境内基督徒对穆斯林信仰产生敌意，进而引发基督徒方面的反击。基督徒在7世纪末针对穆斯林信仰开展的论辩就很可能与此有直接关联。因为此前，基督徒在神学上抨击的对象是犹太教徒、景教徒，7世纪末起才开始注意到穆斯林信仰的异端性。([14], pp.222-223) 这说明穆斯林信仰是在这一时期前后树立了某种独特性，并引起基督教注意和批判的。同时，马立克有意无意营造出的穆斯林与基督教间的对立氛围也势必引致争辩的发生。

7世纪末期，基督徒在了解伊斯兰教的思想后，将之视作是对基督的冒犯。([34], p.73) 尤其是伊斯兰教对耶稣人性而非神性的定位，令他们难以接受。麦基派基督徒就认为伊斯兰错误地理解了基督教的某些^②教义和术语，亦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视伊斯兰教与一性论、雅各布派、景教一样为异端。从7世纪末西奈(Sinai)修道院的僧侣阿纳斯塔西奥斯(Anastasios of Sinai)的《指引》(Hodegos)就体现出，在他们的语境中，伊斯兰教被视为一种基督教下的异端(Christian heresy)。^[36] 大马士革的圣约翰(Saint John Damascene)的作品《异端》(De Haeresibus)亦旨在批评伊斯兰对基督耶稣的异端理解。([35], p.420)

面对伊斯兰教带来的信仰挑战，基督教需要给予回应。这促使了彼时的基督徒，尤其是麦基派的作家整理己方的宗教主张，并学习用阿语表达，以向他们身边的穆斯林争辩。据说对于彼时的麦基派而言，他们主要的活动之一就是应对伊斯兰的挑战，捍卫基督信仰，用阿语书写并散发基督教立场的宣传材料。([35], p.10) 由于基督徒们，尤其是麦基派基督徒在教父(patristic)和仪式(liturgical)上继承的

①落成时间约为公元691至692年，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al-Haram al-Sharif)的伊斯兰教圣地，是伊斯兰时期第一个重要的建筑成就。

②主要是对基督耶稣之神性和人性的理解。

遗产却几乎无一例外来自希腊([35], p.16), 可以想见这一回应将带来弥合希腊学术与阿拉伯语言之间距离的效果, 而翻译运动本身就是将希腊学术翻译为阿拉伯语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此前, 叙利亚地区的基督教学说并没有发展得十分精细, ([35], p.422) 使其得到精进的一个契机正是基督徒与伊斯兰教的对峙。基督教中最先对阿拉伯人的宗教观点给出严肃回应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耶路撒冷的大主教们(patriarchates), ^[34]麦基派的圣约翰就是这一波基督徒中的最早一批人员。([27], p.38) 他是在马立克时期开始作为作家和教会牧师(churchman)活动的, 也是在这个时期, 征服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开始书面争论。([23], p.18) 圣约翰的写作包含的主题有: 总结基督正统教信仰, 定义哲学、逻辑术语, 指出错误的宗教思想和实践等, 这些工作亦是为了系统地回应正在崛起的伊斯兰教的宗教挑战。([27], pp.39-40)

此外, 宗教辩论引出了在宗教教育中加入逻辑和哲学内容的需求, ([1], p.33) 而圣约翰所作的《知识之源》(*Pēgē gnōseōs*) 恰恰意在为读者提供与异教徒论辩所需的智力工具。也许是因为此前少有类似的读本, 这本书成为了希腊和拉丁文基督教世界使用最广泛的哲学文本之一。([1], p.33) 与此同时, 为了更清晰有力地回应他们在宗教领域遇到的争议, 各基督徒群体也开始制定他们自身信仰的标准立场。([23], p.18) 这类需求促使叙利亚的基督徒们更为积极主动地吸收希腊学问, 一个连带结果是, 叙利亚语中借用希腊词汇的现象也在7世纪末变得非常有学术和技术性。^[37]

除麦基派以外, 支持合性观的雅各布派(Jacobite)对伊斯兰的回应也开始于这一时期。([18], pp.32-39) 他们也与麦基派一样将自己塑造为主张明确的基督教会派。^[38]其中的先锋是乔治(George, Bishop of the Arabs), 由于该教派内惯于使用叙利亚语, 乔治便着手将希腊文本翻译为叙利亚语, 这一行动被认为是帮阿拔斯时代的翻译运动铺平了道路。^[39]雅各布派当然也与穆斯林发生了频繁的争辩和交流, 有

研究指出, 这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活动的雅各布教徒正是基督神学论证模式进入伊斯兰信仰的途径之一。([40], p.32)

在上述过程中, 希腊哲学学问显然被更进一步地探索、吸收和应用了。而由该地区的基督教学说及哲学论证此前还未发展得很精细可见, 希腊哲学渗透到基督徒教会生活的程度还是有限的。正是伊斯兰带来的信仰压力, 让基督徒走出了舒适圈。

与智识上向希腊哲学取经相对应的, 在7、8世纪交接之际, 基督徒在输出语言上则向阿拉伯人靠拢。上述对伊斯兰教义的回应瞄准的受众自然是当时的阿拉伯穆斯林, 用以回应的语言也需要是阿拉伯语。在与伊斯兰接触后, 叙利亚的基督徒逐渐接受用阿拉伯语作为教会事务(ecclesiastical)用语, 在这方面行动最快的就要属麦基派。([23], pp.9-13) ([25], pp.11-31) 他们用阿拉伯语表达他们的宗教主张, 是最早采用阿拉伯语作为宗教事务用语的, 到8世纪中, 这一点已经成为了他们教派的特征。([23], p.16) 伴随这份努力, 麦基派成为了阿拉伯的基督教正统(orthodoxy)。^[23]同时, 7世纪末马立克主导的行政机构的阿拉伯化改革, 也被认为促使了基督徒学习阿拉伯语。^[41]

另一方面, 该时期也是穆斯林教法学家开始教义梳理和输出的阶段, 这与基督教的论辩活动不可谓没有关系。当时, 穆斯林的两个宗教学中心分别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伊拉克的巴士拉(Basra), 代表性的学者有加伊兰(Ghaylan al-Dimashqi), 塞夫万(Jahm bin Safwan), 亚萨尔(Hasan ibn Yasar), 阿塔(Wasil ibn Ata)。他们论辩的话题和形式风格都与麦基派教徒圣约翰的作品非常相似。^[42]伊斯兰神学(Islamic theology, 尤其是Kalam)的论证方式也被认为受到了叙利亚一性论教派和雅各布教派的影响。([40], p.28ff) 种种迹象表明, 到了7、8世纪交接之际, 基督徒主教和穆斯林教法学家间发生了直接且深入的交锋。

结 论

在阿拉伯统治的早期，征服地的基督徒与希腊学术以及阿拉伯穆斯林之间仍存在距离和隔阂，这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这两个文化群体间进行有效的智识交往。既有文献总是强调，伊斯兰与基督教的宗教争辩是促使伊斯兰想要得到希腊典籍的诱因，却忽视了这些宗教争辩首先需要的就是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打破隔阂后的正面交锋。伍麦叶时期的社会历史恰恰为这种变化提供了背景和舞台，正是7世纪末阿拉伯内战的告终以及哈里发马立克随后发起的一系列塑造和扩大伊斯兰宗教独特性和存在感的行动，使得征服地的基督徒感到被冒犯，继而展开与伊斯兰教的宗教辩论。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回应是通过研究希腊宗教哲学文本，并用阿语输出的宗教论辩，这帮助弥合了希腊语与阿拉伯语，希腊典籍与阿拉伯、叙利亚的距离。

[参考文献]

- [1] Zeini, A., Martelli, M., Buzi, P., et al. 'Multiple Translation Activities'[A], Brentjes, S. (Ed.) *Routledge Handbook on the Sciences in Islamicate Societies*[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25–38.
- [2] 林德伯格. 西方科学的起源：公元1450年之前宗教、哲学、体制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M]. 张卜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 [3] Donner, F. M.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4] O'Sullivan, S. 'Early Umayyad Syria: A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D]. Scotland: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2003.
- [5] Cohen, H. F. *How Modern Science Came into the World: Four Civilizations, One 17th-century Breakthrough*[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53.
- [6] Ibn al-Nadim. *The Fihrist of Al-Nadim*[M]. Vol.2. Dodge, B. Trans&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579ff.
- [7] Brock, S. 'Syriac Attitudes to Greek Learning'[A], Garsoïan, N. G. (Ed.) *East of Byzantium: Syria and Armenia in the Formative Period*[C], Washington: 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2, 17–34.
- [8] Meyerhof, M. 'New Light on Hunain ibn Ishaq and his Period'[J]. *Isis*, 1926, 8(4): 685–724.
- [9] Takahashi, H. 'Syriac as the Intermediary in Scientific Graeco-Arabica: Some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Observations'[J].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slamicate World*, 2015, 3(1–2): 66–97.
- [10] Goodman, L. E. 'The Greek Impact on Arabic Literature'[A], Beeston, A. F. L., et.al. (Eds.) *Arabic Literature to the End of the Umayyad Period*[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60–482.
- [11] Andrade, N. 'Syriac and Syrians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A], Daniel, K. (Ed.) *The Syriac World*[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157–174.
- [12] Khaldun, I.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M]. Rosenthal, F. (Trans) Dawood, N. J. (E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131.
- [13] 高光福、马学清. 列国志·叙利亚[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14] Donner, F. M. *Muhammad and the Believers: At the Origins of Islam*[M].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5] Sarris, P. *Empires of Faith: The Fall of Rome to the Rise of Islam, 500-700*[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6] Haldon, J. 'The Works of Anastasius of Sinai'[A], Johnson, S. F. (Ed.)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Greek*[C],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323–364.
- [17] Thomas, D. 'Arab Christianity'[A], Parry, K.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Eastern Christianity*[C],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7, 1–22.
- [18] Griffith, S. H. *The Church in the Shadow of the Mosque: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World of Islam*[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9] Valognes, J. *Vie et Mort des Chrétiens d'Orient*[M]. Paris: Fayard, 1994.
- [20] Robinson, C. F. *Empire and Elites After the Muslim Conque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rthern Mesopotami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1] Thomas, D. *Syrian Christians Under Islam: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M]. Leiden: Brill, 2001, 8.
- [22] Parry, K. 'Byzantine-Rite Christians (Melkites) in Central Asia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J]. *Modern Greek Studie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2012, 91–108.
- [23] Griffith, S. "'Melkites'", "'Jacobites'" and the

-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in Arabic in Third/Ninth Century Syriac'[A], Thomas, D. (Ed.) *Syrian Christians Under Islam: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C], Leiden: Brill, 2001, 9-56.
- [24] Mango, C. 'Greek Culture in Palestine after the Arab Conquest'[A], Johnson, S. F. (Ed.)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Greek*[C],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375-386.
- [25] Griffith, S. H. 'From Aramaic to Arabic: The Languages of the Monasteries of Palestine in the Byzantine and Early Islamic Periods'[J]. *Dumbarton Oaks Papers*, 1997, 51: 11-31.
- [26] Leeming, K. 'The Adoption of Arabic as a Liturgical Language by the Palestinian Melkites'[J]. *ARAM Periodical*, 2003, 15: 239-246.
- [27] Griffith, S. H. 'The Manṣūr Family and Saint John of Damascu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Umayyad Times'[A], Borrut, A., Donner, F. M. (Eds.) *Christians and Others in the Umayyad State*[C],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6, 29-51.
- [28] Howard-Johnston, J. *Witnesses to a World Cris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9] Penn, M. P. *When Christians First Met Muslims: A Sourcebook of the Earliest Syriac Writings on Islam*[M].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 [30] Bashear, S. 'Apocalyptic and Other Materials on Early Muslim-Byzantine Wars: A Review of Arabic Sources'[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1991, 1(2): 173-207.
- [31] Kennedy, H. *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M]. New York: Routledge, 1981, 18-34.
- [32] Thomson, R.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2-153.
- [33] Michael, P. 'Early Syriac Reactions to the Rise of Islam'[A], Daniel, K. (Ed.) *The Syriac World*[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175-188.
- [34] Hoyland, R. G. *Seeing Islam as Others Saw It*[M]. Princeton: The Darwin Press, 2017.
- [35] Griffith, S. H. 'The Melkites and the Muslims: The Qur'ān, Christology, and Arab Orthodoxy'[J]. *Al-Qanṭara: Revista de Estudios Árabes*, 2012, 33: 413-443.
- [36] Uthemann, K. *Anastasii Sinaitae Viae Dux*[M]. Turnhout: Brepols and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81, 9.
- [37] Brock, S. 'Greek Words in Syriac: Some General Features'[J]. *Scripta Classica Israelica*, 1996, 15: 251-262.
- [38] Menze, V. L. *Justini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39] Tannous, J. *Between Christology and Kalām?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Bishop of the Arab Tribes*[M]. Piscataway: Gorgias Press, 2009.
- [40] Teriger, A. 'Origins of Kalam'[A], Schmidtke, 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slamic Theology*[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7-43.
- [41] Saliba, G. *Islamic Scien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7.
- [42] Pines, S. 'Some Traits of Christian Theological Writing in Relation to Moslem Kalam and Jewish Thought'[J]. *Proceedings of the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73, 4: 105-122.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